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科学决策方法

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罗杰·J·沃恩 / 特里·E·巴斯 著

沈崇麟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责任编辑：雷少波  
封面设计：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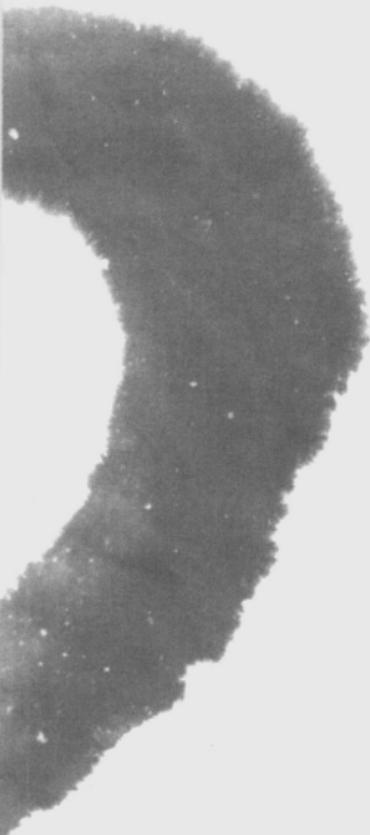
- 本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1. 使高校的教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方面的“真实世界”，以便更好地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者进行交流。
  2. 帮助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者更加系统地考虑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所做所为。
- 我们希望政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坐在一起进行一些分析，以使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能有所改进。
- 我们围绕经验法则和个案来组织本书的各个章节，其中缀以我们认为堪称范例的那些实例——那些我们认为的政策分析艺术中的完美之作。
- 本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学术机构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及社会政策分析者。这些人或从事为决策者提供理论思想的工作，或从事教学工作。他们为那些意欲成为政策分析专家，或直接从事政策制订工作的高校学生，提供必须的基本技能方面的训练。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一本有关政策分析的实用性很强的指南性著作。

ISBN 7-5624-3669-X



9 787562 436690 >

ISBN 7-5624-3669-X  
定价：15.00元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 科学决策方法

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罗杰·J·沃恩 / 特里·E·巴斯 著  
沈崇麟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by Roger J. Vaughan, & Terry E. Buss,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pyright © 1998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3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作者：罗杰·J·沃恩，特里·E·巴斯。原书英文版由 Sage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Sage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Sage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04)第 4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美)沃恩  
(Vaughn,R. J.)，(美)巴斯(Buss,T. E.)著；沈崇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6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ISBN 7-5624-3669-X

I. 科... II. ①沃... ②巴... ③沈... III. ①决策  
学②政策一研究 IV. ①C934②D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475 号

###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罗杰·J·沃恩(Roger J. Vaughan)

特里·E·巴斯(Terry E. Buss) 著

沈崇麟 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周晓

责任校对：方正

责任印制：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625 字数：172 千 插页：32 开 2 页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624-3669-X 定价：15.00 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万卷方法 | 总策划：崔 祝 雷少波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2004.11出版）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第3版)

By: Robert K.Yin

周海涛等译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2004.11出版）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 (第2版)

By: Robert K.Yin

周海涛等译

**调查研究方法**（2004.11出版）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第3版)

By: Floyd J.Fowler,Jr.

孙振东等译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2004. 1出版）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第2版)

By: Robert F.Devellis

李 红等译

**研究设计：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方法**（2006. 9出版）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第2版)

By: John W.Creswell

崔延强等译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2006. 7出版）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By: Roger J.Vaughan, Terry F.Buss

沈崇麟等译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选择与督导**（2005. 8出版）

Telephone Survey Methods: Sampling, Selecting, and Supervision

By: Paul J.Lavrakas

沈崇麟等译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2004. 7出版）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第2版)

By: Norman K.Denzin

周 勇译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2005. 2出版）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Design & Social Measurement (第6版)

By: Delberte, Miller, Neil J.salk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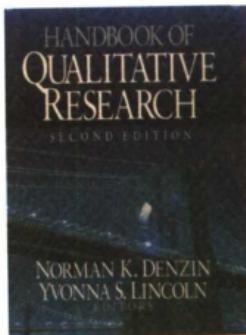
风笑天 主译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2版)

(中文版名待定, 2006. 10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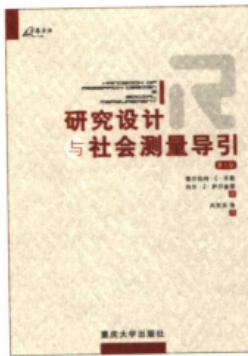
By: Normann K.Denzin Yvonna S. Linciln

风笑天 主译



本书是定性方法论基础，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策略和艺术，定性研究的未来发展等内容，这些内容分别体现在41个专题之中。本书的56位撰写者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均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定性研究方法的相关领域卓有成效的学者。本书主译风笑天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他人员均来自北京大学、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研究与教学机构。

本书第2版的中译本已于2006年12月出版



本书约80万字，涉及研究方法论、科学的研究设计、面面研究选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以至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和出版等内容。同时，为了给学者们提供更大的方便，本书提供了大量国际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传播机构的简明资料以及国际普遍认可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本书作者分别是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社会与商务管理系和坎萨斯大学心理与教育研究系的知名教授。此书由风笑天教授主持翻译。

本书第6版的中译本已于2005年2月出版。

## 作者简介

**罗杰·J·沃恩 (Roger J. Vaughan)** 为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自营政策分析咨询事务所负责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硕士、牛津大学学士。曾任纽约花旗公司(Citicorp in New York)高级经济师、凯里任州长(Governor Carey)时期的纽约州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州长政策顾问委员会(CGPA)的高级顾问。州长顾问委员会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美州长协会的成员。多年来,曾为30多个州的州长做过政策分析。在政策分析方面出版的专著和论文150本(篇)以上。他还曾经在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和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从事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分析。最近三年,他的主要工作在美国国内,作为PADCO公司的顾问,为乌克兰的内阁部长提供技术援助。

**特里·E·巴斯 (Terry E. Buss)** 波士顿萨克福大学(Suffolk University in Boston)苏威尔商学院(Sawyer School of Business)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和数学博士。他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专门论著在200篇(本)以上,内容涉及公共事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1991年来,他在匈牙利、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工作。他两次得到了富布赖特奖学金,一次在布达佩斯大学,关于经济科学;另一次在布达佩斯学院,关于公共管理。他在那里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10多年来,一直担任CGPA的高级顾问。1997年,因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贡献,他获得了有很高声誉的布里琼斯奖(Brizius Award)。在过去的两年,他在国会图书馆的国会研究中心,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从事政策分析工作。

# 为方法理性鼓与呼<sup>\*</sup>

——万卷方法策划报告暨出版说明

究竟是中国内地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漠视，导致研究方法出版物的匮乏？还是研究方法出版物的匮乏，导致学界没有对方法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作为图书出版的编辑人和策划人，对之多论无益。

但，作为图书出版的编辑人和策划人，我们却非常乐意——为方法理性鼓与呼！

我们乐于，也更善于从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的比较中，来了解和表述某一类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情况，以此作为我们图书出版策划的基础。同样，在万卷方法的策划之前，我们便对美国、中国台湾及中国内地三者，1999—2002年间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图书出版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美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出版物的数量之多，至少足以让我们惊讶！由于不便统计，在此，仅就美国的 SAGE 出版公司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图书出版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以窥其一斑。SAGE 出版公司 4 年中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书籍（包括再版书）便有两百余种，其中，既有一两百万字的大部头工具书，如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 Measurement*; 也有 10 万字左右的口袋书，如仅一个“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列丛书”(*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eries*)便有 49 个品种，其中每本书对于案例研究方法、调查研究

\*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 年 3 月 31 日，第 15 版。在此，根据需要作者对原文做了少量改动。

方法、网络调查方法等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其覆盖面之广，研究之深入、具体、操作性强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如果说，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尚可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同一时期，中国台湾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也足以令我们汗颜。4年间中国台湾出版了大量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书，其中不但有本土作者的原创作品，也有从英美等西方国家引进版权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作品。更为可贵的是，其中有几家出版公司已经注意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着眼来组织自己的策划和出版，在这方面的出版有了一定的规模，内容的组织也显得比较成熟：如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的“研究方法系列丛书”、弘智文化事业公司的“应用性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系列丛书”等都是发展比较成熟、规模比较大的专门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列丛书。

而中国内地方面，同期虽然也出版了一批研究方法的书籍，但无论是规模还是研究内容的深入丰富程度都无法与美国及中国台湾两地相提并论。从规模看，这期间中国内地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类的著作也就四五十本，难望美国同行之项背，仅与中国台湾同期出版规模大致相当。从此类出版物内容的深入丰富程度来看，内地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类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各学科内部，如教育研究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等，每本书都面面俱到谈调查、谈案例、谈访谈、谈田野、谈观察等，而很少有对某一种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图书，更没有像美国或中国台湾那样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列丛书。在这一领域，这样的图书结构对于应付大学本科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入门性需求（即作为教材）还行，但对于迅速培养一大批拥有科学、理性的研究头脑的学者，特别是对于青年学者，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成长则是远远不够的。其致命的弱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本书铺得太开而无法细化深入，以至于绝大多数学生虽然上了方法的课，却除了记住了几个名词和对一些方法的理论及应用略知一二之外，至于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方法最恰当、具体怎么操作、这种方法可能会有哪方面的不足需要加以处理等研究细节问题仍然处于无理性状态。其二，既然我们的方法建设囿于学科内部，而不能对方法进行纵深的开发，那么，反正学科就那么几个，于是方法书大多是低水平重复。比如教育研

究方法的书，现在全国使用做教材的至少也有十多本吧，但你若有所心思看的话，一本足矣！其三，出版界对研究方法图书这种淡淡的一笔带过做法，不仅很难形成一种风气，从意识深处提升起大家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而且更加剧了整个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漠视，许多学者只有在著书立说之时才想到似乎从“作品结构的完整性”上看应该谈及方法问题。

社会科学界近年流行两个词语：一曰反思，二曰接轨。所谓反思也即是对于学科的理论基础、学科的结构、学科的历史与未来等问题的全面梳理；所谓接轨也即是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融入世界社科研究的大潮中，与国际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彻底的、清晰的对话。在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反思还是接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和传播界都必须投入一些精力来关注、研究、教授和传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惟如此，才能在中国形成完善、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和学科群，也才能使对研究方法关注与理性应用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深入人心、蔚然成风；惟如此，也才能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搭建一个平台。

以上种种，促使我们策划出版了万卷方法系列丛书，献给忠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

雷少波 崔 祝  
2004年6月于重庆大学出版社

# 前 言

## 专家误入歧途

四十多年前，有那么一些人来到了勒普泰岛（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所著小说《格列弗游记》中提到的一个飞行浮岛）。他们在那前后生活了5个月，虽然学到了一些肤浅的数学知识，但却也沾染了那个崇尚空谈的地方的浮夸习气。这些人回来之后，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顺眼，想要改变包括艺术、科学、语言和数学在内的所有东西。为此，他们申请了一项在拉加多（Lagado）建立设计师学院的皇家专利。这一荒唐之举，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在王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城镇可以任何理由不建立这样的学院。在这些学院里，教授们试图设计发明一些全新的农业和建筑方法，一些全新的贸易方法和制作工具。他们声称，只要将他们的发明付诸实施，工作效率的提高可以十倍计。一个地方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建成，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耐用无比，终生都不用进行任何维修。所有的果实不仅可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季节成熟，且产量也是现在的几百倍。像这样令人欢愉的建议还有很多。唯一的不足是这些建议从来都没有完成过。当时整个国家是一片废墟，房屋倒塌，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沮丧，反而使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在希望和绝望的双重驱使下，更加自觉地推行他们的计划。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1711)

本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①使高校的教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的“真实世界”，以便更有效地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者进行交流；②帮助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者更加系统地考虑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这些人，除非在退休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希望政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坐在一起进行一些分析，以使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能有所改进（同时请参见Hamilton, 1992; Majchrzak, 1984）。目前，学院中的政策分析人员和政府部门中的政策制订者和分析者之间横着一条鸿沟，而且这个鸿沟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大（Kaufman, 1995; Whiteman, 1986），而出于双方共同的利益，我们应该设法缩小这条鸿沟（Goldhamer, 1978）。

我们围绕经验法则（有关这一概念的解释，参见Safire, 1998）和个案来组织本书的各个章节。其中缀以我们认为堪称范例的那些实例——那些我们认为堪称政策分析艺术中的完美之作。这些法则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神圣的、穷尽的，甚至不是互斥的。政策分析者或制订者，为了他们的人文艺术和政治需要，常常会违背其中的某一条，或若干条，在有些场合甚至可能置所有这些经验法则于不顾。这些法则是政策分析人员将自己的报告递交给政策决定者之前所必须考虑的。同样，决策者在评价专家递交的报告时，也应逐项考虑所有这些法则。而最重要的问题却永远是：选择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

书中提供的例子都来自实际。这些例子不仅常常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各种观点大相径庭，有时还是模糊不清，且常常导致过去政策的旧事重提。有些读者可能不同意我们对这些例子的阐述。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争某一特例之长短，而在促使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具有批判性，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观点，也要考虑其他人的观点。理论和思想最终总是可以解决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的，但这只能是在用我们在这里所列举的那些艺术的法则对问题作了缜密的评估之后。

对大多数人来讲，甚至对那些从事政策分析的教学和研究的人来讲，政策分析可能都有那么一种神秘感，因为很少有人能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政策分析一般都是在幕后进行的，有时是秘密的，甚至是在学术机构内进行的，而在前台引人注目的则是那些政客。许

多公共政策方面的教科书上介绍的那些内容，都是作者主观想象的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的所作所为。这样编写的教科书，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也是不真实的。也有一些教科书的作者，他们虽然也头头是道地对政策加以阐述，但却并不了解政策分析和决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则试图让决策过程的阐述变得更加真实。我们的做法是将它与另一为大多数人理解，并都有切身体验的专业活动——作为一个医生的患者联系起来。医生对病人进行诊断、治疗和观察的过程，与政策分析过程惊人的相似。其他的工种——汽车修理工、飞机领航员、复印机修理工和软件维护人员，也与之有相似之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都可能或使用许多可资决策参考的检验单。根据这些单子，即使不能解决他们遇到的所有问题，至少也能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本书自始至终都将医疗过程和决策模型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无非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决策模型。

本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那些在学术机构工作的政策分析员。这些人或从事为决策者提供理论思想的工作，或从事教学工作，为那些意欲在政策舞台上一展宏图，或作为政策分析的专家，或直接从事政策制订工作的高校学生，提供从事这方面工作所必须的基本技能方面的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一本有关政策分析的实用性很强的指南性著作。本书力图避免进行抽象的理论讨论和空洞的说教，也不打算涉足任何社会科学方法、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等领域。传授这方面知识的担子应由其他课程来承担。我们假定本书的读者在这些方面已经在学术上受到过良好的训练，并已打下扎实的基础（例如：Clower, 1995; DeHaven-Smith, 1988; Feyerabend, 1993; MacRae & Whittington, 1997; Ripley, 1985; Weimer & Vining, 1992等，不一一列举）。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已经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或者准备接受学术训练的人在政策舞台上的工作更有效率，而不是使他们与它对立或游离在外，形成一个与之隔离的他们自己的学术圈子（Frey & Eichenberger, 1993; Goldhamer, 1978; Kaufman, 1995; McCloskey, 1985b; Tigler, 1984）。

主流的社会科学政策分析，即使不能肯定是政策分析和政策制订人员的主要信息来源，至少有可能是其主要来源。当然它既不是信息的唯一来源，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来源。在制订可供决策者选择的政策草案的过程中，政府政策分析人员必须关注各种各样具

有可比性的信息，而不要只是关注那些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规范的信息。“不科学”但却可靠的信息常常使我们得以洞见政策中那些为科学的研究报告所丢失的内容。记者、行动团体、智囊团、工会组织、政党、协会和官僚机构都很清楚怎样以他们所需要的方式给决策者和他们的专家提供信息。这些人就是以此为生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学会如何和他们竞争。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使得决策者对它敬而远之。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不仅与实际需要不甚相干，且因不太切合实际、理论色彩过浓、过于专业而令人望而生畏，难以引起从事实际工作者的兴趣 (Frey & Eichenberger, 1993; Hamilton, 1992; Kaufman, 1995)。首先，尊重科学方法和职业规范的社会科学家拒绝从政策角度对自己的著作进行诠释。于是，其他一些不够严肃的人得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到处引用，有时用得很不得当，甚至完全是错误的，忽略了著作的整体含义。其次，那些在著名高校中的学者，试图使自己成为客观的社会学家，他们给决策者提供的处方，或只是一些缜密的理论思考，没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或只是发自观察者的空泛议论，表达的都是一些纯粹的“愿望”。决策者并不希望提供给他们的信息总是标以客观的、主流的和皆大欢喜的 (Hamilton, 1992)。社会科学的政策分析的市场定位也许应做到：信息不仅在科学上是有效的，而且应该被包装成能为决策者所用的。

我们之所以对社会科学有所批评，并非有意要贬低它，实际上我们二人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专业杂志上为学术机构写过很多文章。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使这一学科对决策者更加有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进行变革，至少必须适应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社会科学家过于沉溺于自己的方法，不能公正地对待实际工作者，因而也就无法令人接受他们的那番高论 (Kaufman, 1995)。本书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地使学者们改弦易辙，但我们希望对那些愿意走出象牙塔，更积极有效地参与政策论争的人们有所帮助（同时请参见 Frey & Eichenberger, 1993）。

本书将在三级政府部门，包括准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来阐述政策问题。后者已经是政策制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门。本书后面介绍的法则具有普遍性，并不是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政府部门。

这一点本身就与以往其他的教科书有很大的区别，它们一般都偏向于联邦政策和全国性机构。

本书全书使用**决策者**（decision maker）而不是**政策制订者**（policymaker）一词。在我们看来，政策制订者是决策者的一个子类。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我们自己的打算的。以往的政策分析常常将那些虽然不是政策的最终决定者，但却以各种方式，如通过管理，特别是通过执行把影响政策的高官排除在外。有鉴于此，我们在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总统、州长和市长的同时也投向司法部门的领导，各种机构和组织的首脑和政治领袖，当然也包括他们的雇员。

现在，让我们开始对各种法则的阐述。

# 致 谢

在准备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为政策分析者和公共决策者撰写的指南性论文,得到了俄亥俄州董事会的都市大学计划的资助。美国审计署 (U. 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的高级经济师,罗伯特·波兰得 (Robert Pollard),对本书的前后数稿进行了审阅和评论。路易斯安娜州巴顿·罗格市的经济顾问雅克·巴戈 (Jacques Bagur);来自总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瑞士与福斯特政策咨询事务所已故的杰克·布瑞士 (Jack Brizius);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爱德华·W·希尔 (Edward W. Hill);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政策顾问威廉·诺斯杜特 (William Nothdurt);《改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杂志撰稿人、评论家大卫·奥斯朋 (David Osborne);国家公共管理学院 (NAPA) 的马克·波波维奇 (Mark Popovich) 和芭芭拉·德耶尔 (Barbara Dyer) 仔细地审读了本书的初稿。

我们也感谢州和市的决策者和专家。他们很有见地的实际工作给我们以很大启发。当然,那些参加我们主持的很多政策分析讨论会的学生和实际工作者,对我们思想的发展的帮助更是难以计量。我们曾用本书的初稿作为培训东欧、俄罗斯和南非的高级信息官员的教材。培训得到了美国国家信息局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的资助。参加培训的有匈牙利议会的多名议员、20名市长和市财政局长;罗马尼亚的多名攻读公共卫生学位的医生;来自俄国七个州 / 市 (Nizhny Novgorod, Saratov, Urals Region, Siberia, Far East, Vladimir, and Moscow) 的州一级的部长;以

及由南非新当选的总统尼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任命的省公共财政局长等。虽然本书并未包含有关国外的个案研究资料，但试图将美国制订政策的过程运用于那些对它了解很少的国家使我们受益匪浅。

感谢所有给本书的撰写以慷慨帮助的人。本书存在的所有错误和不当都与他们无关，完全应由我们自己负责。